



全球化 与中国企业跨国市场 进入战略

赵蜀蓉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

与中国企业跨国市场 进入战略

赵蜀蓉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 / 赵蜀蓉著.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647-4116-7
I. ①全… II. ①赵… III. ①跨国公司—国际市场—
跨国经营—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0945 号

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一校一带”行动计划创新创业开放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A03013023001061

全球化与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

赵蜀蓉 著

出 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
大厦 邮编：610051）
策 划 编辑：张 琴
责 任 编辑：马 瑶
主 页：www.uestcp.com.cn
电 子 邮 箱：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mm×240 mm 印张 16 字数 30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7-4116-7
定 价：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028-83202463；本社邮购电话：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必将导致国家与地区间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跨国企业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和重要的载体，如何把握并应对这些变化便成为国际合作与发展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跨国企业不仅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直接行为者，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跨国企业的政治角色由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的脆弱性决定，它必须维护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对稳定，以保证基本的投资和经营环境。国家间关系对跨国企业的经营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而跨国企业对国家间关系的准确估量、判断对跨国企业的经营将造成直接影响；跨国企业对不同时期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的战略应对将决定公司经营的成败与否。

这些问题可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们需要决策者过人的胆识、眼力，甚至高超的运筹和斡旋。主权国家、跨国企业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共同构成了多维的复杂网络，国家与公司间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公司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理顺这些关系，把握清晰的发展思路，这无论对国家的管理者，还是对公司的经营者而言都是亟待妥善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经济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跨国企业为依托的格局。跨国企业代表着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大型跨国企业的数量反映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十分明确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科技创新”，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产品输出、提高国际竞争力，已成为我国跨国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基于此，在我国跨国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依托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理论。

本书试图通过对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战略、国际合作现状与发展战略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在优化技术和资源使用上的有效互补、产生

协同效应的市场进入推进战略，以期为中国跨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生产体系、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及优势品牌输出、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这是显而易见的。诚如著者在“结束语”中所说，本书涉及多学科的内容，更全面的分析“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反书草 2016.11.5.

序二

昔闻：“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今吾读书至仲尼，方知往圣之出人。始周礼废弛，国有君无度，而民不果腹，故孔子作《春秋》以断仁政。是后，百家争鸣，竞绍明世，兹正尧舜之德焉。当是时也，邹有孟轲，楚有屈原，韩有非子，赵有荀卿。此四君者皆贤圣而高远，立说而著书。余常慕之，所以自惟：圣人之笔犹不可辍，况今之吾侪乎？

汉室之兴，出于子房。子房之功，所赖圯上之书也。是以祖龙却竹帛而帝业自虚，黄石授书经而汉得天统。由此观之，夫书，万事之本，而国家之纪也。时易世移，自张骞使月氏后至今两千岁。盖五洲万国，可谓长治久安矣。逢此光美之际，诚宜行文修德，以业黎民之殷盛，务中国之富利。

赵氏蜀蓉，存神明，具博见，通习历世之经典，于文章之道，终积跬步而至千里，作缥帙而晓大义。观其书，则继先圣之德贞；审其人，则知君子之高世。蜀蓉思高危以自戒，念国家以治学。条析其故，乃明哲所云“扶人极、忧后世”也。君学而已、笔而不辍，实为南面之百城。呜呼！吾嘉君心且敬君行，作此文以贻之。

陈生华
2016年11月8日

前　　言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世界各地，传统的主权国家已不再是全球舞台上唯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企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2007 年公布的数据，全球跨国企业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 50%以上、国际贸易的 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 70%~80%、产品研究和开发的 90%以上，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 90%^[1]。其中，由世界权威财经杂志美国《财富》每年评出的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跨国企业数量虽然只占全球跨国企业总数的 1%左右，但其销售额却占所有跨国企业总销售额的 90%^[2]，并且从行业集中度及其生产经营与其他跨国企业的相关性等经济指标来看，全球 500 强都有极强的代表性。

主权国家和跨国企业是国际关系中两大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发展，这两大行为主体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也日趋复杂。自从跨国企业诞生的那天起，它们就开始与主权国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本书在这个复杂的关系网中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来探讨这两类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即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对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影响。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主权国家间复杂和变化的关系对跨国企业的经营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东道国与母国的国家关系将直接决定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市场进入的成败。20 世纪 60 年代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从类别上讲，由于其建立时间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所以学术界称之为“后发展型”跨国企业（即其产生之时世界上已存在大量的跨国企业，且其发展中所采用的技术大多为模仿创新的产物，而非率先创新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跨国企业就属此类。“后发展型”跨国企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提高了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中国跨国企业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壮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后发”优势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然而“后发”困境也极大地阻碍着它们的发展。（“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展型”企业在资金吸引、技术模仿等方面相对于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优势；“后发”困境指“后发展型”企业的“后发展”特质在其经营中造成的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处于产业链低端等不利境况。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作为影响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面对新型国家间关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后发展型”的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并实施有效的市场进入战略将是中国跨国企业经营的重大课题。

本书基于“国家间关系”、“中国跨国企业”和“市场进入战略”三个概念及其相互间关系，探讨国家间关系与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战略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将之与中国跨国企业的后发展性态相结合，深入分析全球化下中国后发展型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战略对国家间关系的应对，并构建起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的中国后发展型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战略体系。

本书将结合实证，挑选有代表性的“后发展型”中国跨国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在新型的国家关系下，对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环境的把握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进行深入探讨，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战略谋划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并对提高我国国际竞争的综合实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2007 年全球经济发展报告[R], 2007: 46.
- [2] 财富. 200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榜[J]. 财富, 2007.

目 录

第一章 国家间关系下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石	1
第一节 跨国企业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	2
第二节 跨国企业国际市场进入理论.....	32
第三节 国内外跨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理论.....	50
第二章 国家间关系与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间的相互作用	60
第一节 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的关系.....	60
第二节 国家间关系与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间的相互作用.....	74
第三节 国家间关系下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战略的变化.....	79
第三章 国家间关系下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历史回溯	83
第一节 中国跨国企业的“后发展”性态分析.....	83
第二节 国家间关系下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演变过程.....	85
第三节 国家间关系下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典型案例.....	100
第四节 国家间关系下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特征.....	112
第四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的国家间关系 之发展与变化	116
第一节 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的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116
第二节 中国与他国的国家间关系.....	121
第三节 国家间关系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影响.....	136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影响	142
第一节 国家间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环境的影响.....	142
第二节 国家间关系对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途径.....	149
第三节 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设计中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子 评估模型.....	160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跨国市场进入战略.....	182
第一节 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的定位原则.....	182
第二节 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战略对国家间关系的战略应对.....	189
第三节 中国企业跨国市场进入的策略建议.....	197
结束语.....	240
后记.....	243

第一章 国家间关系下企业跨国市场 进入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石

跨国企业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

关于跨国企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跨国企业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的理论

跨国企业国际市场进入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TCA)
组织能力理论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alysis)
折衷理论 (Eclectic Theory)
演进理论 (Evolutionary Theory)
市场进入战略组合理论

国内外跨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理论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分类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方法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模型
国外关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理论的研究
国内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理论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 跨国企业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

（一）关于跨国企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1. “自由主义”理论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重商主义实际上成为英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Lall, 1995)^[1]。随着工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业资本逐渐取代商业资本而占据了优势地位，于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不单纯表现为货币的积累，而更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增长，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因此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利益重心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移，对经济的理论考察，便随之从流通过程转到生产过程。重商主义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新的经济学说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韩忠富，1991）^[2]。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正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设和条件的经济自由主义。

（1）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等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受“自然秩序”支配的，这种秩序是完全符合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如果人类充分认识了“自然秩序”，就会根据这一秩序的要求来组织社会和经济活动，这样，社会和经济就会兴旺发达。反之，如果违反“自然秩序”的要求，社会与经济活动就会陷入病态。与“自然秩序”相对立的是“人为秩序”，这种秩序被认为是反自然的和不合理的，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实际上重农学派推崇的“自然秩序”是指资本主义秩序，而“人为秩序”则是指封建主义制度。要按照“自然秩序”来组织社会和经济活动，必须实行竞争、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是保证“自然秩序”的基本力量。因为在自由竞争下必然是等价交换，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也是最合理的。所以，只有自由竞争才符合“自然秩序”。可见，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已经萌生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高华云，2004）^[3]。

其后，自由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被称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重商主义理论提出的资本原始积累手段主要是侵占和掠夺，到了18世纪以后，这种大规模掠夺告一段落，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阶段。这时，它已经具

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外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经济的发展不仅无求于国家，相反，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国家干预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羁绊，于是资产阶级就大声疾呼自由最重要、国家无权干预社会、一切听凭市场自发调节。因此，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和反映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随着亚当·斯密的出现应运而生，并经大卫·李嘉图、萨伊等人的补充和丰富而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其所处的时代，经济自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一个既成事实，作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不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为经济自由大声疾呼和呐喊，而是为经济自由的存在进行辩护和歌功颂德。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在强大的利润动机推动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自由放任政策的指导下运转正常，由此经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相适应，长期在西方经济思潮中占据正统地位。

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人们看到的是，在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凯恩斯主义者”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局面，给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新自由主义由此迅速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局面，主要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因此它们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推崇在发达国家对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对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崇拜者则号召放弃国家所有制，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价格政策和过多的国家干预，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让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应当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欢迎国外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持个人本位观的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孪生兄弟。从本质上讲，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通过垄断资本控制全球，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获取最大利润（舒晓昀，1996）^[4]。

（2）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自由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以及马歇尔；虽然新自由主义分为不同的学派，但是其理论都源自自由主义。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个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理论学派。

① 自由主义理论

亚当·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他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其理论的核心在于，由于自由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市场经济能得以迅速发展。而国家只能起“守夜人”的作用，不能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斯密从人性即资产阶级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即受利己心支配的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为避免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他认为，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是实现经济自由，而不是国家干预。斯密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让资本家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采纳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每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而采取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功利主义，是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每个人在对己有利也可能对国家和社会最有利的情况下，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地自由运用其劳动与资本，自然也就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违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政府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他极力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此说明市场的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的能力，并把无拘无束的对外自由贸易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还力图在分配领域贯彻自由放任原则，指出供求关系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又趋向于符合劳动的自然价格，工资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他比斯密更为激进地把政府的作用降到最低点，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彻底鼓吹者。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的所谓“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萨伊认为，商品的买卖，实际上只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货币只是一瞬间起媒介作用，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即使在某个时候个别部门会出现供求脱节的情况，但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局部的、暂时的供求失衡会趋于消失。萨伊相信，只要政府对经济不横加干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就可以对生产起自动调节作用，克服市场上暂时

出现的生产与销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局部不平衡。萨伊定律旨在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均衡的调节性，因而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应鼓励自由地发展生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萨伊定律成了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否认经济危机的有力武器和理论支柱（吴易风，2002）^[5]。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其全部理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之上的。马歇尔认为，“竞争”一词不能很确切地适用于现代工业生活，而必须用“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者更简单地用“经济自由”代替它。在马歇尔看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既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又是经济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消费者有选择消费品的自由，雇员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生产者有进出某一行业和选择生产要素的自由。个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形成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又决定商品和要素的价格，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并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那也是人们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由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结果。马歇尔崇尚经济自由，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推崇备至。

②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既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思想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何慧刚，2004）^[6]。尽管各个学派的理论来源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理论存在一些共同点，即：都强调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干预作用的最小化；主张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坚持自由贸易为最高原则，反对实施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等等。

第一，信任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提倡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新自由主义者始终坚信，在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在要素市场上，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能够精确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时间价值，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实现有效配置。国家干预经济的体制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相反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造成价格信号的扭曲，进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他们主张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以达到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但不完全拒绝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只能是裁判、征税人和守夜人，其职能和作用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拾遗补阙、有限干预。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但他们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资本主义，只是主张尽可能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

第三，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严格保护私人产权。

新自由主义学派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强调对私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要使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率地运行，就必须严格界定与保护社会经济中的各种产权。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其归属和自由交易受到保护，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最优化行为才能推动整个经济实现“帕累托效率”。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私有化产权界限比公有化的产权界限更为明晰，可以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应该主张私有化，也要求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私有化。他们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公平地竞争，才能使经济达到内在的稳定性。

第四，主张维持市场竞争，反对垄断。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打破市场垄断。因为垄断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难以形成资源的充分利用；垄断组织可能凭借自身垄断优势干预市场正常竞争，取得超额垄断利润，扭曲经济。

第五，健全财政政策，反对通货膨胀。

市场在自由放任的环境里运行，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使得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如何控制这些因素给经济带来的冲击，避免经济危机的再度爆发，盯住通货成为他们的首选。只有通货稳定，经济才有可能平稳运行（翁熙，2001）^⑦。

（3）对自由主义的评价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学术界产生的分歧都很大，有些人全盘否定，有些人极力鼓吹，有些人批判地吸收。结合种种观点和自由主义诞生以来的社会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对自由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影响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是“经济人假说”，这一假说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假说也存在不少缺陷，以致许多经济问题在这一逻辑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说明，甚至于不可能有效地提出问题。此外，从哲学的角度看，“经济人”假设不过是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用语，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逻辑分析，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并且缺少

应有人文内涵。因为在这种假设下，“经济人”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出理性的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都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丰富的人性仅仅被概括为自利的精明计算（陆昂，2006）^[8]。

从这一角度看来，斯密的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说法，反映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人们的社会联系是歪曲的。斯密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和联系的方面，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斯密把私人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赖以决定的前提，而不知道私人利益本身是由社会决定的，私人利益的内容及其实现都取决于社会条件。斯密所说的人性，不过是资产者的阶级本性。他所说的利己心和利己主义，不过是资产者的利己心和利己主义。斯密错误地把属于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人看作是具有不变本性的一般的人，把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本性看作是一般人的不变本性。虽然如此，斯密建立在人性论上的自然自由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这一思想反映年轻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不像重商主义者那样认为年幼的资产阶级必须依靠国家的支持，也不像配第那样认为正在从幼年成长为青年的资产阶级在感到自身力量的同时又感到还要有外部力量的支持，而是认为封建君主制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支持这一信念的，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相信市场机制可以自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斯密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受客观的经济规律支配，而不以君主或国家的经济政策为转移。斯密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实质，是要求人们公开地承认社会应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也就是要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对于新自由主义，由于其摒弃政府的宏观调整政策，提倡依靠市场的自发机制，从长远来看，降低了市场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宽了对金融领域的公共调控，在宏观上易造成不稳定；同时，新自由主义统治加剧了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潜在地打击了投资积极性，加上大众购买力明显下降的趋势，会造成需求总量的不足，加大了促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永恒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观点也是非常荒谬的。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客观的基础，但是同时又具有社会性质，由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经济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大致处于变动之中的特定形态之中。作为社会经济和历史现象的市场及其法则，与永恒化、超越社会或“神圣化”完全无关。市场并没有超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者们的权力和影响，恰恰相反，是为其服务的。在最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